

# 莫将美国对难民的义务抛给中国

《纽约时报》记者狄雨霏在该报网站上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冷眼旁观难民危

机,指西方自食恶果。文章批评中国对叙利亚难民问题不够热心,迄今提供的救济款不多,该文还指责中国学者宣扬美欧搞乱了叙利亚,应该“自食其果”,承担帮助难民的责任。

这位纽约记者还是挺会转移目标,帮美国分忧解难的,出其不意地一竿子打到中国身上。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舆论对华盛顿在其中应负主要责任的浅显逻辑,以及美国推诿接纳和帮助难民的明显事实,都做了选择性忽略。人们几乎看不到美国主流媒体关于这场危机根本就不该发生的反思,同样几乎听不到美国从政坛到舆论场对这个国家应当承担“自作孽”后果的道义呼声。

然而纽约记者却能及时、犀利地发

现“还有一个中国”,她批评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没有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为难民提供的救助款多,用这两个看上去矛盾的排序做一个丑化中国的标签,似乎挺合适的。

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经济规模大就应为救助国际难民多出钱的逻辑,连美日及欧洲国家的政府也没有这样的要求。救济难民应当积极,但也需量力而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内部贫困的问题还远未解决,由中国扮演救济、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主要角色,这不是世界舆论的期待。

除了经济原因,中国在地缘上和事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上,都比欧美离叙

利亚难民危机遥远得多。由中国挺身而出向被这一危机困扰的欧洲大伸援手,这同样不是世界舆论的期待。

而欧洲和世界舆论都在期待美国向难民打开国门并提供更多捐款,对美国搞乱了叙利亚却不肯出力善后的批评在世界舆论场上比比皆是。美国政坛和媒体上的这种声音最弱,也最含混不清,狄雨霏女士难道没有发现这一点吗?

当然,美国媒体有心维护美国的利益,这点未必不能理解。但是道理还是需要讲清的,不能颠倒是非。围绕难民潮的起因和救助责任,美国媒体可以沉默,但乱咬就很合适了。

说到中国,抛开外媒的意见,我们自

己今后针对难民事务采取能被世界舆论识别的更积极态度,还是有必要的。实际情况是,如果中

国太积极了,西方会受不了。那样的话,我们会遭到新的警觉。但如果中国表现的积极性不够突出,西方也会不高兴。鉴于中国当下的特殊地位,我们做好事也需有把握好“度”的智慧。

美国有影响世界舆论的能力,它能大体做到让自己“怎么做都是对的”,忽视外界对其“不对”的批评。中国这方面没法跟它比,中国的难处是“怎么做都不对”,做得更努力、更细致是我们现阶段

的宿命。中国或许有必要针对叙利亚难民问题采取一些外交行动,比如派特使,向联合国提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倡议等等。叙利亚难民危机不排除出现进一步的连锁效应,中国应朝前评估,争取主动。▲

## 中印等新兴经济体须合力应对危机

【新加坡】马凯硕 【印度】吉瑞加·潘恩迪

### 诺奖得主对中国经济的误判

当中国股市出现下跌以及人民币贬值时,那些早就对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就心有成见的西方评论家们都情不自禁地因中国经济打了个“跟头”而沾沾自喜。

甚至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为自己之前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得意洋洋。但就误解东亚而言,他拥有近乎“完美”的记录。史蒂芬·里博曾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生动地描写了克鲁格曼对亚洲的无知。“1994年,克鲁格曼对新加坡经济做出过类似评价。”他(克鲁格曼)写道“新加坡是苏联增长模式的经济孪生体。”切记,苏联在1994年被视为严重失败的经济实验。

与此同时,克鲁格曼还将这套推理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其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上,这包括香港、台湾和韩国。他当时对“亚洲四小龙”下的定论,与他目前对中国的推论几乎如出一辙。他声称,“亚洲四小龙”都已耗尽或濒临耗尽其所有可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且其未来生产力缺乏任何提升迹象。当然,现实并未向那个方向发展。此后,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实现大幅增长。其实,无论以任何方式衡量民众的福祉,如今的新加坡都已超越美国,从人均寿命到人均GDP概莫能外。

克鲁格曼并非唯一误解中国增长模式的西方专家。同样不出所料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刊出封面故事,并配以“中国大衰退”的标题。大衰退?现实更为微妙。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朝翰颇有见地地总结称,“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不能曲解人民币汇率和股市的波动,这些现象只是纠正此前的估值过高问题,绝非所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信号。”

### 新兴经济体能让自己免受全球经济混乱影响吗

显然,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需要调整结构以进入下一增长阶段。中国当前领导层深谙相关挑战;尽管一些短期挑战必然伴随此类改革纷至沓来,但中国领导人对其改革计划坚定不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已盛赞中国的计划:重组金融体系及其庞大的国有企业,努力提升消费在增长模式中的作用。没有

多少国家拥有开展此类重组举措所需的坚强领导层——而中国领导层从未在该任务前退缩半步。我们看到中国金融市场的那些波动现象,恰好反映出坚定的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似乎不少人普遍误解了这些计划。

即便如此,《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指向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担心——“新兴市场容易遭受全面危机的影响。”《经济学家》强调这一点是正确的。从今往后,新兴市场或将共进共退。如果开始衰退,它们就别再指望出现以往的那种大规模救援措施。心神不宁的欧美人已无帮助世界其他部分的愿望。当然,他们更没兴趣帮助通常被其视为未来威胁的更大新兴市场。

这就是新兴市场应该明智地开始为最严峻状况而未雨绸缪的原因。鉴于现代金融市场的反复无常,且往往被计算机化的交易程序所放大,我们料将看到证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出现更多动荡。而且,美联储甚或仍将实施其制定已久的加息计划,即便此举可能将引发全球经济混乱。美联储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其唯一的使命是经营并保护美国经济。所以,美联储肯定会将美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尽管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吁背道而驰。

新兴经济体能想方设法确保自身不受全球经济混乱的影响吗?是的,它们能如愿以偿。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应该宣布双方正开展高层经济对话,以力争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增进协调合作。目前,中印两国的GDP之和接近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2/3。此外,若两国继续在未来10年内保持较为保守的6.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到2025年时,双方的GDP总和就将翻番至24万亿美元,相当于使世界GDP新增12万亿美元。

### 新兴经济体若各自为战很难独善其身

当然,此类合作并非易事。印度和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尚未像美国、加拿大和欧盟成员国之间那样密不可分。中印两国经济承受的压力亦不相同。中国的经济规模为10.36万亿美元(2014年),远大于印度的



2.07万亿美元(2014年)。由于中国是出口/制造业导向型经济,而印度是消费/服务业导向型,两者间的合作存在一定困难。但如果进行合作,双方都将受益匪浅。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印度将需要填补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亏空。中国能够提供解决这一亏空的投资和援助,且其效率高于任何国家但成本却最低。对双方来说,此类倡议是显而易见的双赢之举。倘若高层经济对话将催生出生通重要经济合作的大胆举措,就将引发市场的关注。所有这些都需富有远见的长期领导层。

心理因素同样对市场至关重要。若新兴市场经济体试图各自应对全球经济乱象,更容易遭受暴风雨的侵袭。即便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亦难独善其身。然而,若新兴经济体宣布一项共同合作的政策,那么市场将会做出不同反应。人们将发现新兴市场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当中印两个亚洲巨人用同一个声音发声时更是如此。除经济领域外,同一个声音还将使两国在气候变化和反恐等全球治理事务上大受裨益。

中印两国的合作,还将有助于加快两个经济体间利益日渐趋同的速度。由于西方消费者仍对未来感到紧张和不安,中国通过向发达市场出口以促进增长的模式或将不再奏效。与之类似的是,随着美欧对印度工人入境施加新的限制,印度向发达市场提供信息技术(IT)和其他后勤服务的传统模式也在承受重压。此外,随着IT产业提升自动化水平,未来几年内印度的IT企业很可能将江河日下,除非它们进行彻底改造。

与此同时,中印两国未来将最终拥有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其总和或将接近15亿,几乎相当于欧盟和美国目前人口总和的两倍。若中国和印度能将东盟纳入其经济合作,它们就将涵盖亚洲第三大中产阶级人口。这三大中产阶级人口将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中产阶级人口。这将大力吸引投资者进入该地区。随着长期投资者开始对亚洲未来的中产阶级人口寄予厚望,相关市场就将随之做出反应。当上述场景成为现实后,西方专家们的自鸣得意就将不知所终。▲(作者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原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副总裁兼亚太业务主管,本文由王会聪翻译)

树挪死,人挪活。开放多元的流动性社会,职业转换本是平常事,何以一个地级市市长的辞职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政商“旋转门”的讨论?笔者认为,这与转型中的中国现代化大背景紧密相关,不是简单的敞开或关闭“旋转门”便可解决的。

政商“旋转门”,本是一个政治学话语,是指政客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间的双向转化流动,企业高管可以就任财政部长,财政部长卸任以后可以转业企业高管。这种职业转化方式,只要符合一定的法律规定和“职业回避”制度,在国际社会实际很常见。何以在当代中国,这却成为长期困扰“政商关系”的难解难分的“制度性问题”?

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从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中走来,过去“政企不分”的体制,决定了国企高管本来就是政府高官,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本为一体”并相互流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其实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调整过程。这涉及到众多问题的改革,至今还在进行之中。

## 也谈梅永红辞职

周少来

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体制转型的“政商一体”调整进程中,出现了复杂的难以厘清的、甚至不少“负向”的政商关系,很多在职的或离职不久的政府高官,在自己职位管辖的领域或范围内,纷纷被企业高薪聘用在企业兼职。造成了难以“说清”的利益输送关联,难免让人们产生“瓜田李下”之嫌。自2013年10月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来,不符合党纪规定的政商“旋转门”,理所当然被清理或“关闭”。

在开放多元、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随着职业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进程的加快,“政商之间”、“政学之间”、“政学之间”的“转换”必然越来越多。可能出于“官场压力”或“个人志向”,一名官员当然可以在辞职之后,在符合国家规定的“三年隔离”和回避相关业务领域的原则下,按照个人的“意愿”,到民企做“高管”,到事业单位任“顾问”,更可以到高校当“教授”。或许其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更能让他人尽其才。从社会层面来看,这才是人才效用最大化的应有之义。

其实,中国的政商“旋转门”从未真正“堵死”,而是存在政商双向流动的“不平衡性”,更多的“转换”是单向的。例如,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之间的“门”是“双向开放”的,但从政府高官到民企高管的“门”更多是“单向开放”的。因为从政府官员到民企当高管很容易,但从民企高管到政府高官的“旋转”则是难上加难。我们目前还很难做到像新加坡那样,从社会医生、律师和私企高管中选拔社会精英成为“政府高官”。古人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种政学、政商间更加流畅的转换,也能让人们头脑中长期积淀的“官本位”思想被冲淡。

这样看来,政商“转换”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的“禁止关闭”,也不是听之任之的“随意转换”,而是制度化、法治化的梳理和管理,关键是什么样的“旋转门”可以放行,什么样的“旋转门”坚决堵死,可以“放行”的又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和条件,这些程序和条件怎样才能真正制度化地落实到位,加强对各种“旋转门”转换之间的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不是简单的“关”,也不是简单的“开”,公开、透明的制度化治理才是正途。▲(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